

杨鹤林与日新圩

金 理 搜集整理

日新鱼圩座落在菜子湖与白兔湖交界的西畔、双店乡的东边的一个椭圆形的湖滩里。南从瓦竹嘴，北至松山脚，筑起一道近千米的长堤，圈起近二千亩的水面，与伸延在棕阳县境内的黄公山隔河相望。

这个鱼圩到现在已有七十来年的历史了。要追溯它的创建经过得从辛亥革命前夜，双店榆树人杨鹤林留日归来谈起。曾一度在留日期间受民主革命思潮熏陶的杨鹤林，参加过徐锡麟领导的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安庆起义失败后，徐锡麟被害，他按在头上的假辫子识破被抓，人险些被害，他死里逃生，遁回故乡——桐城双店榆树方庄。他的父亲杨翰庄，是前清秀才，家资富有，在双店一带享有盛誉。杨老先生一方面看清了当时民主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趋势，一方面又很为儿子安全耽心。他为了能稳住儿子杨鹤林不再冒风险、隐匿乡里的心情，可以极力赞助儿子走实业救国、发家致富的道路。而杨鹤林自己也深切感到，多年为民主革命奔波，除了成为亡命之徒，别无可得，不免有些意志消沉，加上父亲施加的压力，也就毅然应诺，矢志于乡里，做点有益于社会，又有益于个人的实际工作。这应被认为是杨鹤林能专志于圈筑日新圩的思想基础。

年过花甲的杨翰庄好不容易得到儿子的应诺，于是，凭他在双店一带的威望，在一九一四年秋冬之交的一天，邀集乡里的大小地主和头面人物，谈了自己圈筑渔圩的主张，要与会者大力资助、支持。经杨翰庄这一出面撮合，中小地主们无不举手赞成，并当即组成圩董理事会。杨翰庄借口年老力衰，荐推儿子杨鹤林负责筹划，

还提议中小地主们也让后起子弟出来协助杨鹤林共同工作。而杨鹤林也主动地去串联他们的子弟，奔走乡里，共同磋商、规划以及筹募等等。围圩基金先定为八十股，每股八十元（银元），杨鹤林首先自购二十股，然后三股五股、一股半股，发动友好自由认购。这些按股摊收的围圩基金，只限于购置围圩所需的工具和材料，至于劳力，悉由历来欠地主们地租的佃户承担。于是，这年初冬，便在一个偏僻、荒凉的湖滩里，兴起了当时确为罕见的围圩工程。为了赶在第二年汛期到来之前，能够告成，杨鹤林以他的年轻自许、热血方刚，不怕苦、不怕累的耐劳动头，带领和鼓舞着那些人们奋战在圩埂工地。尽管天寒地冻，他们总是鸡鸣即起，星出而归。对于挑圩取土，离圩远近，都有明确规定，经取土后，可形成的方字塘的深浅，子埂的宽窄，亦有具体要求。每一地段工程结束，无一不经杨鹤林一一验收过目，凡是不符合规定与要求者，概令返工。强调各负其责，不可马虎。其布置之周密、安排之得当、计划之合理、考虑之过细，实非寻常人可所及。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终于在1915年春，鱼圩雏形基本告成，圩埂两端也安上了鱼簰。

谁料夏季汛期到来，经验不足，初建的圩堤经不住潮水的冲刷，等到汛潮退落，圩埂百孔千疮，漏洞比比皆是，有些地段向下颓塌，杨鹤林目睹现状，心情沉重，不得已，只好再次借重杨翰庄的声望，邀集中小地主和圩董们洽商，决定将圩股扩为120股，每股股金120元，而后再串走乡里，发动友好认购。可是现实情况，就是原股不动，也得增交40元，这消息一传出去，不胫自走，有些小康人家大多从苦熬中起家的，平时一钱如命，非常吝啬，大都不愿再把白银继续投向没有指望的湖滩上，对原先认购了股把半股的，

也已懊悔莫及，若再增加数额，比什么都难，甚至有的要求退股。杨鹤林面对这一情况，真是绞尽了脑汁，伤透了脑筋，他把这种苦衷向老父亲讲了，杨翰庄表示支持，那怕倾家荡产，也不能让圈圩事业半途而废。如此一来，杨鹤林把自己的20股增加到30股，对原来只有一股半股的小康人家，要求退股的，也示意认可，决不强留；对原来三股五股的，尽量说服，绳之以理，如仍坚持要退者，凭圩董们议定，转股金为股债，按年付息，定期偿还，取消股董资格；当然也有为数极少的人家，与杨家有裙带联姻关系的怯于情面，由原来三股的，增加到五股的，或是由五股的增加到七股八股的，也不乏其人。

经过一个秋季的准备，股金又筹足了，杨鹤林又亲自临阵，身体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兴起圈圩的工程。这次用上百个立方的木材沿外圩打桩，圩基镇下上千吨的大岩石，内圩用岩石堆砌，为了防止颓塌，靠外圩的桩内又用五百口火缸罩下，圩埂两端，先建涵洞，后安鱼簖。这些基础工程竣工后，杨鹤林重新一一检查工程的质量，在他认为达到工程标准要求后，为了赶在汛期前，又鼓动圩区群众加快步伐，给圩埂加高、加宽、加厚，靠外圩，是用发动佃户铲来的带根的草坯巴上，以防冲刷、浸洗，靠外圩圩脚和挑埂时形成方塘的子埂，遍植杨柳，以形成护堤的绿色屏障。靠内圩四周广种苇草，以防圩内淤塞，堤埂两边，栽上桃、杏、梨、柿等果树。经过这样再次的努力，圩埂巩固了，才能谈得上如何养殖发展养鱼事业。

一九一六年冬，鱼圩基本告成。

鱼圩告成，并不等于万事就绪，就有收入。事实是三、五年后，圩埂巩固了鱼苗长大了，环绕圩堤上的树木成荫结果了，才初有收

益。可需要兴建的和要做的事繁多，杨鹤林适时提出：圩堤初建，当前只能做到支付平衡就行了，应使圩董们谅解；而圩边群众应先使受益，后才能使群众成为圩堤的义务保护者。鱼圩初建，在鱼圩周围的群众确能得到一点好处。如果干旱，可以用圩内的蓄水灌溉，群众车水，圩董们并不反对；如果涨水，河水被阻在堤外，沿圩边的田地也不致受淹；到梨子成熟时，小孩大人摘它个把吃吃，也不计较；渔人在圩内捕鱼，只要不是家鱼，也不碍事。可是好景不长，圩董们就提出，要圈定圩界，严格制定管理鱼圩的各种章程。杨鹤林只好找熟悉圩边汉湾、塘、堰、水田情况的圩董们，共同实地考察，一一记清所属，再把沿圩佃户、保甲长、豪绅们请来宴会，席间说明意图，与赴宴者共同议定：圩内所有被淹的塘堰、水田都归鱼圩所有，稻田进了水，禾苗即成为喂鱼的饲料，稻田里的鱼任何人不得捕捞；若遇旱年，圩内水不准用来灌溉，不许车水、挑水；除鱼圩内的船可以下圩外，群众渔船一律不许在圩内捕鱼或行走；圩埂上的果木，不许攀摘……。所有这些，都分别订好契约，契约就是法律。对于违犯者，圩董们议定，采取一谈二敬三罚。一谈限于初次，只记下姓名、住处，摆摆契约，谈谈讲讲算了；二敬是指再次，令其买爆竹带着铜锣到埂头或是居住集中的圩边，边敲边放，并须讲清违犯契约，以示敬戒；三罚是指三次以上者，令其办酒席，请来圩董们、族长、保长……，这些当地的头面人物，严重者，不仅罚办酒席，还要按照契约提出处理意见。如此一来，圩边佃户们起初那种积极圈圩的劲头，不仅是没有了，想不到圩建成了，却成为他们的灾难，真是有苦说不出，怨声载道。而杨鹤林有违初衷诺言，心情也并不舒坦惬意。

圩埂巩固了，契约也有了，那么如何发展鱼圩养殖事业，便成

为杨鹤林谋虑的中心。他是采取养殖与引诱双管齐下。

杨鹤林一面遴选对水产养殖工作热情的陈策三，到上海学习，一面请对养殖鱼苗有经验的严家训来圩内饲养，但他又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把从江里捞起的象麦芒一样小而透明的鱼苗，先放在筑好的鱼花池里，用鸡蛋、糯米粳、豆浆饲养。头批苗长得快，只需喂七八天，即可放入圩内，二批三批苗长得慢，得喂两旬以上，方可放入圩里。

杨鹤林在悉心学习和观察养殖情况的同时，尤其重视引诱。他曾对圩董们讲，每到春夏之交，汛期到来之际，对如何引诱江鱼进入圩内，格外感兴趣，简直是迷上了。其方法是：一用香饵，二用落差响声，把潮里的鱼诱入圩内或是诱入靠近圩埂边的方塘里。在离大埂百步的湖面，筑起一条小埂（这在挑圩埂时就已计划好了的）与大埂平行，小埂上面密植杨柳，汛期到来，小埂淹没，但茂盛的杨柳，婆娑湖面，俨然象道道绿色的城墙，阻挡着风浪，屏障着大堤。此时，应抓紧时机，把炒香的糠麸沿着小堤撒下，或用菜油饼穿孔，用绳穿着，每隔十来米，逐块系在小埂柳树上，湖鱼觅食，闻香纷沓而至，加上闸放水的哗哗声，齐集闸边，由缺口进入圩内，未入圩者，亦大都滞留在埂外方塘里。

日新圩经过杨鹤林这样苦心治理和不断与大自然反复奋战后，鱼的产量逐年增加，最高年产量达到十二万斤，埂外方塘每年产鱼约两万斤，外加圩埂果木收入，实为可观。

对于鱼圩收入，如何合理开支，杨鹤林提出，不能分光，要有收入的一半留作用于鱼圩的建设，而且要节制使用。当时，每股在每年岁尾可分得鲜鱼上百斤，红利20元，夏秋季节，每股又可分得十斤、二十斤不等的桃子、梨子或柿子。这些好处，很使原先退

殷的小康者眼馋，恨自己目光不如喝过洋水的杨鹤林先生看得远，真是叹服不已。

而鹤林先生并不陶醉于已取得的收益，倒觉得对圩边佃户过意不去，似欠了他们什么。所以每年果熟时，总是叫人通知圩边群众去秤五斤八斤桃子或是柿子，岁末秤鱼时每户5—10斤不等，都记在他的账上。年年如此，从不亏待圩边群众。对于平时，方园三五里群众，死猫、死狗，投入圩内者，记下姓名，到岁末以鱼酬谢。正是由于此举，杨鹤林当时不仅在统治者和中小头面人物中享有威望，即便是劳苦大众也莫不称赞，赞誉杨鹤林治圩有方，对待有别，其人对人对事的睿智，实是一般常人所莫及。不亏为当地群众都推崇他为德高望重的人。

杨鹤林对于圩区建设也不遗余力，年年兴建，年年改进。在鱼圩北埂，紧贴堤边，兴建圩屋，圩埂两端和中间修建八角凉亭，通往圩埂道路，一律用麻石条砌铺，而且年年向前伸延，拟议中，还想在圩内中间修建水榭楼阁，逐渐使鱼圩成为夏天避暑，冬天喧闹，景致优雅的地方。

正当杨鹤林经营鱼圩卓见成效和怡情满志，双店一带绅士无不向往的时候，一场特大的水灾降临了，这就是一九三一年的特大潮水。往年汛期到来，只不过大埂外围的小埂被淹，潮水也就稳住不涨了，但这年水位一直上涨，漫过小埂上绿色的杨柳梢，狂风裹着暴雨，大有浊浪排空之势，直扑大堤，流量越来越大，直至大埂全部淹没，杨鹤林虽和圩董们日夜守护大埂，也无济于事。眼睁睁地看着圩内的鱼成群追逐，游入江湖。杨鹤林十多年来的心血，付于东流，其心情之沉痛，是可想而知。待水退尽，圩埂露出，树木倒于烂泥，浮土冲刷殆尽，只是埂基尚较坚固。亟需重新圈筑，进一

加宽加高培厚，对于能够挽救的树木，更应扶植培土，这大批的钱如何筹集？是按股摊派还是撒手不问？杨鹤林所采取的方法是：既不按股摊派，也不借此不问。他认为，受灾之年，大家都难，地主们靠田租过日，田地被淹，日子也就过得不宽裕了。至于不问，当然是不应采取的，当初一片荒凉的湖汊，能有现在这个样子，真是好不容易，何况埭基尚较巩固。于是他自己裁定，一面动用积余的钱进行修整，一面委托圩董严家训、金剑如管理圩事，自己奔走任职。他为了能捞到一笔钱回来，曾应关麟徵、杜聿明之聘，出任当时的二十五师军法处长，供职不到一年，向关、杜陈说自己的意愿和苦衷，又回到故乡，亲自筹划鱼圩的一切事务，重新建筑湖上的蓬莱仙境，直至四七年老死，凡知道杨鹤林者，无不极其悲恸。

原来的一片荒凉的湖滩河汊，经过杨鹤林兢兢业业，悉心治理，终于赢得了埭固而鱼肥，景美而宜人，怡然自乐之情，犹如置身蓬莱仙境。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凡足履双店者，未有不以游览日新圩者为快。

桐城县木杨区联防队起义投诚经过

陆少扬口述 光 昶整理

抗日战争后期，桐城县处在敌、伪、顽军交错地区，它与庐江、舒城、潜山各县相临的地区，也是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地带。在此四不管地区，有些“草莽英雄”，如丁双飞、刘东雄、关怀玉……等趁机而起，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扰乱治安。他们都是混世魔王，没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所以后来都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收编，改为自卫队，领了番号，但仍驻原地各霸一方。

一九四七年四月，桐城县以东西南北四乡为四个联防区，每区建立一个联防大队，即以收编的部队作为兵源，或加以扩充。各乡下设中队。当时，东区（汤家沟）大队长章万全，南区（棕阳区）大队长刘东雄，西区（木杨）大队长杨金声，北区（孔城）大队长项世贵。

与此同时，各区建立补给会，负责筹办枪支弹药粮饷。

同年十一月份，将行政区与联防大队合并，改为联防区，以原有区长为联防区主任，大队长为付主任，实行军政合一。原区补给会改为戡建会，设正付主任委员各一人。

木杨区即老柘区，为适应军事形势，区府设在双港附近木杨乡，故名。

木杨区地域东至金神，南至罗岭，西抵青草，北达范岗，共辖十三个乡镇。

一九四八年十月，淮海战役期间，有桂系二十五整编师驻在桐城，安徽省保安第三团驻在练潭。木杨区联防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新安渡大桥的安全，保证安合路畅通。

十二月份，国民党军队从淮海战场溃败，人民解放军有南下之势，地方游击队更加活跃，二十五整编师撤离桐城，准备渡江南逃。桐城县政府失去依靠，也迁到罗家岭办公。

四八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桐城县政府命令木杨区主任陆少扬把部队全部集中，准备把人枪掠走。这天傍晚张护棠由县赶回。

四九年农历正月初二日，张护棠与陆少扬在双港附近一个姓潘的家里密议，决定率部起义投诚，不跟广西佬走。

张护棠当时是桐城县参议会付议长兼木杨区戡建会主任委员，同徐伯俊关系很好。

徐伯俊即徐伊复，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书记长，与张护棠同事，私交甚笃。此时，他是华东野战军某部干部科科长，特地赶到桐城，在阍达章旅舍动员张护棠起义。同时，桐城县人民政府付县长叶桥生也向张保证安全，既往不咎（张同叶也是旧交）。

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木杨区联防大队中校主任陆少扬率部起义（少校付主任杨金声，四川人，已于四八年十一月份逃走）。除第三中队长汪孔见逃走外，第一中队长潘栋，第二中队长王苾臣，直属队队长胡云龙都率领全部人枪起义。

本来，郭任县长，叶树生付县长，赵瑾山政委等当面讲好，起义部队开到桐城，由县人民政府接收。后来，部队开到范岗时，由驻军皖西军分区基干团三营接收了。

还有孔城区高桥生中队当时驻防在香铺街，也由陆少扬通知他一同起义了。

起义部队当时编入解放军，参加渡江战役，官佐全到教导队学习。

解放前桐城社会现象一、二

陆少扬

桐城地处江淮，是有名的文化古城。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忠臣孝子，理学名儒，无代无之。同时又是安徽省六个甲等县之冠（桐城、六安、合肥、阜阳、宿县、宣城）。在1946年春间，根据安徽省政府指示的精神，进行一次户籍整理，整编乡保，以赋保、地形、人口为依据，将全县划为四个区，62个乡镇，保的数字不详。如：

一、汤沟区（原桐东办事处改的）所辖18个乡镇，计有：汤沟镇，云潭乡、白梅乡、白石乡、白柳乡、金社乡、将军乡、吴桥乡、忠毅乡、后方乡、周潭乡、施湾乡、周水乡、四眼乡、陈公乡、鸾凤乡、六洲乡老武乡。

二、棕阳区（原义津区改的）所辖14个乡镇，计有：棕阳镇、罗岭乡、罗龙乡、黄石乡、黄根乡、永安乡、官埠乡、义津乡、鞠隐乡、雨坛乡、高甸乡、巢山乡、孟凤乡、会官乡、安凤乡。

三、孔城区所辖14个乡镇，计有：孔城镇、石南乡、桐梓乡、大关乡、适吉乡、麻投乡、吕亭乡、南演乡、南炉乡（南坊同炉泊乡合并的）、金神乡、杨湾乡、官青乡、阳和乡、钱桥乡。

四、木杨区（原老梅区改的）所辖12个乡镇，计有：练潭镇、木崖乡、杨公乡、双河乡、平天乡、老梅乡、张陡乡、银峰乡、张云乡、青草乡、金松乡、曹岗乡。

五、桐城直属乡镇有：孟侠镇、龙眠乡、石龙乡、黄甲乡四个乡镇。

以上这些区、乡镇长都是省干团受训的“干训生”，其中有少

数极个别的乡镇长是民选的。区长由省委任，报中央铨叙。乡镇长由县委令，不报铨叙，是属于地方自治人员，不是国家官制。至于保级人员也是县干训所受训的。不是“干训生”就无法插足，“干训生”把持县政。所以当时在校学生有“毕业即失业”之叹。“窗下十年不及立煌三月”。这是新桂系在安徽统治的驯服工具，也是他统治的政治体系。

他处心集虑为了要达到长期统治安徽，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千方百计挖根绞髓地标新立异，利用和拉拢地方封建势力，美其名曰“自然领袖”、“社会贤达”。如城里的姚达之、许难先等；东乡的刘让泉、周晓山、吴运南、吴雷生、钱宴如等；南乡的朱伯瑜、王子寿、张晤灵、吴涤礼等；西乡的张护棠、郑金侯等；北乡的慈宪民、孙大朝等。这些人都是所谓“赋有声望”的人，也是豪绅中的魁手。并延伸到各乡参议员，于是为他们歌功颂德，炫耀自己，把雪山当作“靠山”，为虎作伥，来光耀门楣，显赫乡梓，鱼肉人民，压榨人民，此乃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也是好景不长的黄粱美梦，双管齐下，终成泡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政府官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个人第一，享乐第一，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之度外。一班政客官僚，上下交征利，颓废腐化，黑暗贪污，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相互标榜，彼此吹捧，金迷纸醉，虚图华丽。至于请客送礼，送往迎来，比比皆是，已经是司空见惯。直至解放前夕，摇摇欲坠之势，社会风气之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混事都来了，无妖不现，无寄不有。口说仁义道德，身行男盗女娼。当时讽刺国民党的政客官僚有一首民谣：“一身猪狗态，两眼官势钱，三

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兼（无耻）”。请看下面触目惊心吓人听闻的事：

一、1945年前后，在桐城县长陈汉流（广东人）任内，贪污之风极为严重，如：区长谢广文（寿县人），镇长谢履中（桐城水圩人），骑马挂刀，身跟保镖，花天酒地，大肆贪污，挥金如土，娶小老婆。经向法院告发，为了掩饰当时人们的耳目，扣留审查。结果暗中放纵，黑夜逃走，以通缉了事。1945年春，主任秘书刘铁生（绰号生铁牛），为了袒护包庇乡长贪污，坐享鱼利，贪图享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手持手枪，奔赴法院大闹，严重地威胁首席检察官周伯眉的安全。不久，周只得忍气吞声奔赴庐江高一分院，幸免于祸。当时满城风雨，舆论哗然，只是敢怒不敢言。后经中央司法部来电追究，县长陈汉流利用上级私人关系，将刘铁生调离，到合肥三河去当办事处主任，结果以不了了之。

二、1946年，在县长全无若（广西人）任内，田粮处长李致知（广西人）贪污粮食达两百多万担，经告发后，省会扣押，解送究办。结果县长全无若维护老乡，不但没有扣押，反而通风报讯，便利潜逃，通缉了事。

这些仅仅是个典型例子而已，其余大大小小的贪污枉法的行为，何只万千？